

落日心犹壮

何西来 著

作家出版社



落日心犹壮

何西来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落日心犹壮 / 何西来 著. -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
2017.5

ISBN 978 - 7 - 5063 - 9110 - 8

I. ①落… II. ①何… III. ①中国文学 - 当代文学 -
作品综合集 IV. 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09328 号

落日心犹壮

作 者: 何西来

责任编辑: 赵 莹

装帧设计: 张晓光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 数: 243 千

印 张: 16

版 次: 2017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9110 - 8

定 价: 30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代序 落日心犹壮

唐大历四五年间，即公元769—770年，杜甫流浪荆湘时，虽贫病交加，居无定所，以舟为家，却仍然系念天下苍生，以国家安危为心结，不肯消沉。五言律诗《江汉》就是表达这种心境的名篇。我特别喜欢后四句：“落日心犹壮，秋风病欲苏。古来存老马，不必取长途。”去年老友冯立三兄七十大寿，诗人邵燕祥兄以绝句二首贺之，其第一首是这样四句：“谔谔昔闻剩一夫，共随老马辨长途。诚知落日心犹壮，又道春风病已苏。”

燕祥诗的首句，用的是《史记·商君列传》的典故：“千人之诺诺，不如一士之谔谔”。谔谔是直言争辩的样子。燕祥的“一夫”，就是“一士”的意思。立三兄为人耿直敢言，即使剩下他一个人，只要他认为对，就会坚持到底，不怕孤立。后面的三句，则化用了老杜《江汉》诗的基本命意。立三前些年因为忙《小说选刊》的事，没日没夜地拼命，以致积劳成疾，患上了严重的糖尿病。很有一段时间被病魔折磨得情绪低沉。去年恰逢七秩寿庆，病情缓解，他又情绪大振，心态极好。生日聚会，以亲友故旧众多，而先后举行几次。大家都为他高兴，燕祥的贺诗，反映的既是朋友们的希望与祝福，也是对立三“落日心犹壮”的精神境界的抒写。

人到晚境，去日苦多，越来越靠近生命行程的终点，再加上病痛

越来越多地光顾，亲友故人的不断离世，自觉红颜老去，白发盈颠，心绪容易落寞，乃至消沉。然而，人活的就是一股劲，一口气，一种精神。即使到了如杜甫那样百病缠身，艰难苦恨的凄凉晚景，也还是要有一颗跳动的“壮心”。杜甫的《江汉》诗，显然能看出曹操《步出夏门行》（即《碣石篇》）里“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；烈士暮年，壮心不已。”的精神承传。曹操是一代雄才，曾以丞相之尊封魏王，加九锡，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。他的这几句诗，应该是晚年的自明心志之作。正因为有这种壮心，他的晚年诗作，才显境界开张，透出苍凉的豪壮之气。杜甫则因为壮心不泯，晚年诗作也才能于悲壮呜咽中更见沉郁顿挫。

“初唐四杰”之一的王勃，在《滕王阁序》里曾有“老当益壮，宁移白首之心”的话，常与曹操的“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”一起，被上了年纪的人拿来作为励志、自策的格言。王勃写“老当益壮”的话时，只有二十多岁，不像后来老杜的年近花甲。但我至今仍常常吟诵他的这个名句，虽然已经年逾古稀，我是宁取令我奋起，催我自强，让我共鸣的“落日心犹壮，秋风病欲苏”，而不取王维的“晚年唯好静，万事不关心”。

2010年11月刊载于《老同志之友》

目 录

代序 落日心犹壮

辑一

黄河西来决昆仑——我的自传 / 3

家道兴衰与财富聚散——我的父族和母族的故事 / 10

追忆我的高考心踪——半个多世纪前的一段陈年旧事 / 19

进西大 / 24

“文研班”的读书生活 / 29

往事如烟 / 40

关西大汉的自叙和自审——我说陕西人 / 46

我的“活命哲学” / 56

辑二

我的启蒙先生 / 63

铜烟袋锅——我的暑假先生 / 71

铜烟袋锅后篇——再谈我的暑假先生 / 79

追忆傅庚生先生 / 85

刻在心上的记忆——追念何其芳同志 / 88

愚人节的感伤 / 92

要经得起查书 / 98

并非不必要的补遗——关于俞平伯先生的“书生气”和“书生诗” / 101

追念钱钟书先生 / 103

圣火不熄——悼念荒煤同志 / 107

老马识途不识茶 / 112

童庆炳的学术人格 / 117

悼念张仃先生 / 121

辑三

我崇尚为人生艺术 / 127

为文以真 / 135

我的风格研究 / 137

文风倡导和人格建设 / 141

我所经见的三十年文艺批评 / 146

重传承 善养气 / 157

未来的探索者——知识分子 / 159

辑四

从泣血之作说起 / 163

未若文章之不朽

——序《现象环与中国古代美学思想——梁勳遗文集》 / 167

追怀文学的献身者——序《路遥纪念集》 / 171

流派开山之作——柳青《创业史》重印本序 / 179

情欲和子嗣——从莫泊桑的《一个女雇工的故事》想到的 / 193

理想、英雄、操守和胸襟

——“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文学读本”丛书出版感言 / 197

辑五

我和骊山老君庙 / 201

虎情悠悠 / 205

居庸关漫兴 / 210

登兖州少陵台 / 215

“父母官”议 / 218

砚话·笔话 / 221

说“诗眼” / 228

易俗社百年华诞感怀 / 231

碧绿的红豆杉 / 235

后记 / 245



輯

一

黄河西来决昆仑

——我的自传

我的本名是何文轩。文轩既是小名，也是后来的学名、大名。父亲起的。西来，是近十多年来常用的笔名，遂以此行世。最初，并没有什么讲究，不过是从李白“黄河西来决昆仑，咆哮万里触龙门”中随便截下几个字。后来细细一想，还有所谓的“圣教西来”，达摩西来，但我不信佛。

我于1938年阴历二月二十七日（阳历三月二十八日）亥时，出生于陕西省临潼县秦始皇陵东上何村，即今之秦俑博物馆所在地。家乡风俗，清明前后要打秋千。据说母亲就是打秋千后的那天晚上，骤然临盆的。我出生的那年，母亲刚过十九周岁，正是贪玩的年龄。由于在这种情况下呱呱坠地，小时候淘气时，族中的年长者总要半开玩笑地喊我秋娃子，说是打秋千生的娃，就是匪气。

何姓人家在上何村聚族而居。高祖何湘汉是读书人，一名贡生，似乎连举人的功名都不曾取得。他精通《左传》，学生有四人中举，因而在临潼县也就颇有一点名气。听说连县太爷也曾乘轿请他到县城去讲过经。曾祖父何元升读书不用心，常背着高祖赌钱，秀才也考不取，倒是花钱捐过一个廪生的资格。何家人丁不旺，至曾祖数世单传。但到了祖父，却有四弟二妹，高祖希望长孙成材，逼祖父读书十多年，读到家里的塾师先生死了两位，也没把他教出来。他的学问止于能读《三国》《列国》《聊斋》一类的“闲书”，对《纲鉴》也很熟，但一辈子提不起笔。他庄稼活极精，是附近有名的“把式”，摇耒、撒籽、铡草入麦秸，样样拿得下，而且喜欢种树，有很高超的嫁接技术，常被人请去帮忙，他为人耿直，对曾祖母极为孝顺，与性情懦弱的祖母相处得也很融洽，但对七个儿子却颇为严格，很有家长的威势。

父亲排行第二，小名虎儿，大名碧山，又曾单名一个渊字，取号岩泉

道人。他虽然也曾跟临潼骊山三元洞一位姓卜的道人有过交往，甚至搞到一个颇为精致的“福缘善庆”的化缘簿子，声称要去做云游道士，却终因尘心太重，丢不下妻子儿女，留下了。何家家道到父亲一辈，已完全堕入贫困。他一天学也未上过，十多岁即带着几位叔父去学生意，但靠了刻苦的自学，他的文化反比祖父还要高，毛笔字写得很工整。他一生总想从我们那个焦苦的穷地方挣扎出去，但最终还是做了农民。他做过小学教师、县政府公务员、中学事务员、邮差、农场工人，经过商，被国民党抓过了，也当过解放军的逃兵，一辈子和命运抗争，一辈子碰钉子，是一个苦命的失败者。他脾气不好，说话不顾情面，常常是哪壶不开提哪壶，得罪了村干部，上世纪中后期差一点被打死、斗死。

母亲姓安，离上何村三四里地的安家沟人。小名省娃，莲如的名字是嫁到何家后祖父给起的。母亲的家族曾经是一户暴富的财东，到外祖父安定朝，已家道陵夷，但有钱人的做派还在。外祖父有点文化，上过西安的洋学堂，但学问底子并不比我的祖父强。外祖母是原下戏河侯家村的名门闺秀，常和在外拈花惹草的外祖父怄气，母亲九岁时，她便身染沉痾，撒手去了。此后外祖父曾先后续弦、纳妾凡四人。从我记事起、直到1965年他去世时，我还有一个外婆和一个“新外婆”。外祖母去世后，母亲不堪继母虐待，她的外祖母又念没娘的外孙女可怜，便拢在自己身边。所以，母亲和她的侯姓舅家的关系，要远比和自己娘家的关系亲得多。她出嫁前的大部分时间，都生活在侯家，连和父亲结婚的大媒，也是她的姨母做的。

我的第一个启蒙先生是我的祖父。在堂兄弟中，我最早来到这个世界上，既是祖父的长孙，也是当时仍然健在的曾祖母的重长孙。虽说因为淘气，常惹祖父生气，但他和祖母都很宠爱我。我是唯一跟他们睡觉的孙子。大约是四岁的那年夏天，祖父坐在院子里看“闲书”，小声念着。我也好奇地跑到旁边跟他鹦鹉学舌地念。他很高兴，说：“这鬼子孙，还是个念书的坯子。来，爷爷给你找本书念。”于是，他翻箱倒柜地拿出一本用朴拙的楷书选抄的古诗，以唐诗为主。这是当年他的祖父亲手抄给他念的。我学的第一首诗是“七岁孩童子，当今入学初。要知今古事，须读五

车书”。半年过去，我居然也能背出四五十首。出门走亲访友时，祖父喜欢带着我，常常把我抱到桌子上、椅子上、碌碡上站着，让我背诗给人家听，并且笑眯眯地听人家对我的夸奖和对他的恭维。其实，我对自己背的诗，绝大部分不理解，只是念口歌，觉得好玩。

转过年，快到五周岁了。迎春花开的时候，祖父让在外面做生意回来的三叔父带我到村塾去拜先生，从此便被圈了起来，开始正式启蒙。我是一个淘气的学生，常受老师责打，喜欢逃学。有一次，因为把一块烧红的柴火梗儿放在同学的脖子里烧得滋滋响，同学痛得哇哇叫，吓得我逃出校门，几天不敢去上学。

那年，父亲在临潼县政府谋到一个专管在泾惠渠收水费的公务员职位，便把母亲、我和大妹接到县城去住。我也就转到县城小学读书。这是全县最好的小学，校址建在当年的横渠书院旧址附近，县上人称为书院门小学。在学校里，我调皮、贪玩，不用功，作业潦草，考试成绩平平，多是七八十分。很脏，冬天拖鼻涕，夏天的灰布学生服上，总是墨迹斑斑。初小四年级的上学期，被班主任牛老师选中，去参加学校讲演比赛。训练很苦，背熟讲演稿不算，每天还要提早到校，站在院子里一遍一遍地讲，并配合以手势、表情、语调。落雪了，就站在雪地里练习，手都冻肿了，形成溃烂的冻疮。后来正式比赛，居然获了奖，我很受鼓舞。

1947年春，父亲失业。县城不能住了，我们全家便搬回上何村。夏天，我考入离家稍近的新丰镇鸿门小学高小，放榜时竟是第一名。但后来仍不用功，淘气。有一次，把一位叫张大眼的同学从双杠上拉下来，张大眼的胳膊摔成骨折，气得教导主任白澍乎老师骑在我身上用戒尺狠狠地打了一顿屁股，几个礼拜坐不了板凳，走路也一瘸一瘸。

在鸿门小学的那两年，由于国民党当局进攻延安，加剧对进步青年的迫害，许多有才华的人便到我们这个小镇上任教。语文老师除课本外，还给我们选印些“五四”以后的著名散文读，像朱自清的《背影》《匆匆》等，我就是那时熟读成诵的。这两年，我住学生宿舍。上不起灶，每周回家背一次馍，多是玉米或杂粮做成。没有菜，吃饭时用开水一泡，吞下去了事。夏天馍会发霉，冬天又冻得砖头一样，但也一样吃，一样高兴，不

以为苦。由于父亲失业，家里很困难，但母亲说，无论多苦，也要供我把书念成。母亲不识字，无文化，对于什么叫“把书念成”，并无明确标准。父亲倒是多次说过，念好书，将来能在邮政上或铁路上谋一个固定的饭碗，就很不错了，至少也要像我七叔那样去开汽车。至于做官为宦、光宗耀祖的事，他们都没有提过。这可能与父亲对腐败的国民党政权的仇恨有关。

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，父亲也经他的一些地下党的朋友介绍，在西北军政大学招生处做事务长。7月，我高小毕业。按照父亲的意思，我由六叔陪同，步行七十里去西安考中学。初试落榜。父亲异常震怒，买了一条扁担，一根麻绳，一双草鞋，在西安我的姑祖母家里罚我跪下，骂我生就是“打牛后半截”的坏子，要我回临潼去跟大伯父上山割柴，一辈子当“穿烂棉袄”的庄稼头。后经姑祖母一家人劝说，才答应我第二次报考西安市二中，好歹算是考上了。

这年秋雨绵绵的九月，我成了何家的第一个中学生。学校在西安市东郊韩森寨的藏经塔边，离城远，离家更远。秋风秋雨里，我想祖父，想祖母，想母亲。十一岁的男子汉有一次竟因此哭得谁也劝不住，以致校长说，实在不行，就把报名费退给你，回家吧。我才意识到自己肩负的责任。不哭了，想家也不哭了。军政大学向四川开进时，父亲家庭观念重，一个小差开回农村，到老也没出去过。后来他一提起这事就后悔不已。家里弟妹多，经济十分困难。四妹刚满月，就送给一户稍为富裕的王姓人家收养，母亲哭得泪人一般。我在学校虽然有一点助学金，却连吃饭也不够，钱接济不上时，饿得头晕眼花的情形也有过。母亲是家里最苦累的人：田里的活，她要给父亲做帮手；要纺线、织布，供应全家八口人的穿衣；此外，还要给别人做针线活，为我和后来也在西安读书的大妹筹学费。我能坚持把学上下来，确实是和母亲的苦累分不开的。

家境苦寒，上学不容易，我也慢慢地懂得了用功，学习成绩有所提高，喜欢作文、演讲、讲故事，比赛常得第一名。初中时，两位语文老师对我后来走上文学道路影响很大。一位叫冉于飞，经常在报纸上发表点小文章。他个头不高，皮肤白嫩，戴近视镜，和学生说话喜欢先来一个“你

娃娃……”，然后才进入正题。我们几个淘气的学生便私下送他一个绰号：“冉娃娃”。“冉娃娃”老师对我很好，作文常给我得高分，有时还在班上宣读。另一位初中语文老师叫沈楚，听说是作家茅盾的堂妹或侄女，也戴近视镜，对我要求比冉老师严格，虽欣赏我的作文，却轻易不给高分。1957年，沈楚老师和她的丈夫双双被划为“右派”，遭遇很惨。

初中毕业时，我以年级第六名保送本校高中部。学生中间，竞争激烈，这大大激发了我的进取心。和同班的城里学生比，我穷，吃得差、穿得破，寒暑假回家还要干沉重的农活。我唯一可以和他们一比高低的是学习成绩，说什么也不能让任何人把名次排到我的前头去。

我做到了这一点。虽然前三名的分数咬得很紧，但直到毕业，我的年级第一名的地位始终未能易手。这对形成我的乐观而自信的性格影响很大。我仍喜欢语文，但成绩却低于其他功课，尽管比同年级的同学都高。语文老师叫齐世勋，解放前在兰州大学做过讲师，能写古诗，喜欢饮酒，教我们语文时年逾六十，牙齿大部分脱落。在作文上，他给我严格的训练。班主任叫蔡克勤，教政治课。我们的周记由他批阅，每次发下来，都有认真的批语。记得有一次批语是：“勿以善小而不为，勿以恶小而为之。”道理似乎不深，但对我做人影响很大，至今仍感到真正做到并不容易。

1954年我抱着一种神圣的、献身的热情加入了中国共青团。临近毕业的那一学期，选拔留苏预备生，谁都不怀疑我会被选中，班主任蔡老师也已经和我谈了话。但后来政审时却因为我外祖父是地主，落选了。这件事对我打击很大，我铁下一条心去学文。这是一个关键。告别母校时，蔡老师谆谆告诫我：“以你的才分，在社会上混一碗饭吃不难，但要真正有成就却非下死功夫不可。”我的这位尊敬的老师，1957年也被打成了“右派”。

1955年8月，我接到西北大学中文系的录取通知，9月报名入学。《红楼梦》就是这个时候读的，读完后有好几个月怅然若失，情绪总也转不过来。我的一段让人感伤的初恋，就发生在这以后。它还没有展开，就由于我的幼稚而中止了。

在西北大学学习的几年，我一直是学生干部，当着班长。1956年，经高年级的两位同学介绍，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1958年，我提前毕业，留校做助教，并与另一位助教共同辅导并参加中文系杜甫研究小组，执笔写成《论杜甫的世界观》和《论杜甫诗的艺术风格》。前者刊发于次年的《西北大学学报》上，后者两年之后连载于《文学遗产》上。这是我学术研究的起步。

1959年秋，我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文艺理论研究班。这是人大和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合办的，学校负责学生管理，文学所负责教学及辅导。何其芳与何洛两位先生分任正副班主任，除文学所的有关专家学者外，北京和全国的许多著名理论家、学者，都给我们讲过课。这几年，正赶上三年困难时期，虽说不时被饥饿、浮肿干扰过，但因为折腾少了，反而坐下来认真地读了几年书，为我以后的研究工作打下了较为扎实的基础。我的第一篇当代文学论文《论〈创业史〉的艺术方法》，也是在这个时期发表的。在这篇文章中，我对素芳形象的分析，对作者某些意图的推断，都颇得柳青首肯，他生前曾向许多研究者推荐过。

1962年夏天，我认识了一位到北京姐姐家养病的小姑娘。她叫韦凤葆，住在我们同一栋楼的西头。天真、娇小、伶俐，五年后，我娶她为妻。

我的毕业论文导师是唐弢先生。根据他和何其芳先生的意见，我于研究生毕业后的1963年10月调到文学所工作。从这年到1976年的十三年间，除了“急用先学”、“立竿见影”地读过一点马恩列斯毛的著作之外，业务基本上抛开了。

“文革”后这十五年来，我主要从事当代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研究，偶尔也写点古典文学的研究文章。1985年12月出版第一本专著《新时期文学思潮论》（江苏文艺出版社）。此后陆续出版的著作有《探寻者的心踪》（论文集，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2月版）、《文艺大趋势》（论文集，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）、《新时期小说论》（与人合作，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版）等。此外，还有大量未入集的论文。从这些论著中可以看出我的文化学术思想逐步摆脱教条、僵化、封闭模式的艰难过程。它们分别反映了我在写作当时的真实认识，反映了我崇真尚实的文学观。

近十五年来，我曾先后担任过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，《文学评论》副主编、主编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主任，学位委员会副主任，并曾被聘为延安大学兼职教授。现为文学所研究员，学术委员，中国人民大学图书资料中心学术顾问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